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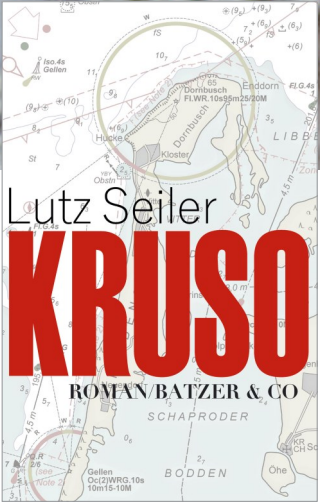
卢茨·赛勒

对于德国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卢茨·赛勒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德国当代文坛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至今已出版多部诗集。《克鲁索》是卢茨·赛勒第一次尝试创作长篇小说，小说2014年出版后便引起了极大反响。除德国图书奖外，《克鲁索》还同时荣获2014年度乌书·约翰逊奖。目前，这部小说已经被翻译成超过20种不同的语言，销售20余万册。

卢茨·赛勒1965年出生在德国图林根州的格拉，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之前，他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学徒。在东德国家人民军服役期间，卢茨·赛勒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并尝试创作了一些长诗。1990年，他进入大学学习，曾先后在哈雷市和柏林市的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专业，其间，卢茨·赛勒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89年夏季，赛勒曾经在希登塞岛上的克劳斯纳做过洗碗工，这段经

历成为《克鲁索》的主要素材之一。

《克鲁索》以1989年的东德为故事背景。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挚爱女友的大学生艾德选择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来到希登塞岛上的一家饭馆当了洗碗工。在当时的东德，希登塞岛俨然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的庇护所，这些人会在旅游旺季时到岛上的旅馆、饭馆或者酒吧打短工，希登塞岛也因此聚集起一批艺术家、作家、演员、音乐家、科学家。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希登塞岛“属于那些得享极乐的人，白日做梦和梦中起舞的人，属于失败者和边缘人”。希登塞岛上的另一类人是那些想要逃离东德，去往自由世界的“叛逃者”。小岛与丹麦的默恩岛隔海相望，看似近在咫尺的另一个世界使得许多东德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逃离祖国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这两种人的存在共同给小岛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这个“边界内的最后一个自由之乡”成为展示人们对自由渴望的舞台。



在克劳斯纳，艾德结识了亚历山大·克鲁索维奇，也就是众人口中的克鲁索，两人由此开始了一段奇特的友谊。克鲁索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众人所追寻的所谓自由会发出仿佛塞壬女妖歌声一般“魅惑人的叫声”，会引诱追寻自由的人踏上一条不归路，而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他们希冀的远方，而是根植在每个人的内心。在这种对于自由的理解之上，克鲁索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王国，通过极具仪式感的“分配日”“圣汤”



背景模糊地投射在故事人物的个人命运上。在小说开头，“平生第一次，他有了逃亡的感觉”，但艾德的“逃亡”却与当时千千万万想要逃离东德的人的目的完全不同。艾德选择的是童年时跟父母惟一次度假去过的地方，这使艾德的“逃亡”更多了一层象征的意义。他并非要逃向象征自由与富裕的西方世界，而是要回归自己的内心。艾德的希登塞岛更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他一起在克劳斯纳工作的短工们谈论的是文学与诗，

他们共同维护的克鲁索王国里每日进行的是带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各种仪式，逃亡的人不是“难民”，而是“遭遇船难的人”。对于外界正在发生的事，这里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谈论。惟一能够让读者联想到当时历史背景的是克劳斯纳厨房里的收音机“维奥拉”，但“在厨房重重叠叠的回应中，它的声音飘忽得让人难以定位”。现实对于克劳斯纳的人而言，就像“维奥拉”模糊的声音一样，反而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非现实的存在。

正如罗曼·比舍利在《新苏黎世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位不了解1989年那段历史的读者，他不知道当时大批的人如何借道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离境，并由此拉开两德统一的大幕，那这位读者绝对想不到这部小说里除了这个遇到心理问题的年轻人的故事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卢茨·赛勒这部构思大胆的小说讲的虽是德国转折时期的故事，但却对那些决定性的事件只字不提，作者显然是刻意将目光投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许多采访中，卢茨·赛勒都曾反复强调说，他在小说中最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自由的一些观点，正如主人公克鲁索所言，自由根植在每一个人心中，只是有的时候被掩盖住了，有的时候已经腐烂了。对于每个人来说，找到这条根都是非常重要的。

卢茨·赛勒认为，《克鲁索》并不是一部以转折为题材的小说，而是一个鲁滨孙式的历险故事，一部描述两个男人之间友谊的小说。小说用“克鲁索”这个与《鲁滨孙漂流记》中主人公名字发音相近的词，从一开始就点明了两部作品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克鲁索与艾德一样，也曾经失去过挚爱的人。类似的经历和同样对诗的喜爱使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友谊，艾德就像是跟在鲁滨孙身边的星期五一样，对克鲁索忠心耿耿，而克鲁索对艾德来说既是挚友，又像父亲。但不同于《鲁滨孙漂

流记》的是，克鲁索和艾德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完成了角色的对调。曾经因为失去女友而迷失生活方向的艾德正是在这种角色转换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

在时代转变的洪流下，克鲁索一手搭建起的乌托邦一点点分崩离析，曾经紧密地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克劳斯纳的短工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克鲁索搭建起来的理想王国，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失去了拥戴者的克鲁索身上曾经笼罩的光环开始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浓重的悲情色彩。克鲁索成了“一个孤独的军队统帅，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一个正在冻僵的英雄”。这时，艾德和克鲁索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曾经生活在克鲁索庇护下的艾德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慢慢进入了他的新角色”，因为“现在得由他负起责任来”。曾经的诺亚方舟现在仿佛一艘风雨飘摇中的小船，同时昭示着艾德和克鲁索的命运。身受重伤的克鲁索被父亲从岛上接走，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成为克劳斯纳“最后一个短工”的艾德独自支撑着克劳斯纳，直到从收音机中听到两德边界已经打开的消息。随后，他也离开了希登塞岛，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一位擅长诗歌创作的作家是否能够驾驭长篇小说这种题材，对此，人们在《克鲁索》问世之初曾经表现出各种疑虑。事实证明，《克鲁索》完美地结合了诗歌与叙事文学的特点，成为一部别具特色的“诗人小说”。卢茨·赛勒在小说中对于历史线索诗意化的处理使得这部作品显得非常与众不同。罗曼·比舍利将卢茨·赛勒的这种叙事方式称为“诗意的挑衅”，并说：“卢茨·赛勒本可以把这部小说写成政治小说……但小说与政治事件却始终保持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松散联系。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诗意的挑衅：就像是被略过的历史事件与书中个人命运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样，小说的力量也正在于它没有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

## 动态

## 聚焦“一带一路”国际出版合作

2017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召开

8月22日，作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在京举行。论坛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今年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以“‘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出版合作”为主题，邀请国内外出版行业专家、学者聚焦行业热点话

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蔡达峰、中宣部副部长崔玉英出席论坛并致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发表主题演讲。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后，“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国内外出版行业也掀起了“一带一路”热潮。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解读了“一

带一路”政策，从出版角度深入分析“一带一路”的新形势，抓住“共同复兴”和“相互包容”这两个关键词，倡导国际出版大合作。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期刊出版全球总裁伊恩·班纳曼通过网络数据对世界学术资源和合作进行分析，论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学术上已经与中国有很多合作，未来还将有上行趋势，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出版物是“一带一路”合作中促进相遇相知、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论坛上，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执行董事理查德·察金、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戚德祥、印度尼西亚图书委员会主席劳拉·普林斯陆等结合各自的出版从业经验，探讨了丝路国家的最新出版热点、如何抓住热点开展合作等问题，并分享了成功的经验案例。(王 杨)

## 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召开

近日，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翻译领域的老中青学者，就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展开讨论，会议还同时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路径。

峰会的主要形式是青年学者圆桌研讨与专家讲座和点评相结合。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是两个密切相关的议题，外国文学研究者应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相互促进。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认为，目前，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截然分开的现象很普遍，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基本上不做翻译，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不算研究成果。有一些人翻译了大量作品，但译本往往只有简单的序言，介绍作家生平、作品和故事内容，而老一辈翻译家的译著都附有长篇序言，精细分析和介绍作品，这一做法应该提倡和坚持。郑克鲁说，翻译理论对翻译确实有指导作用，却不能代替翻译本身。当今译界的一大缺憾是忽视翻译技巧，要少谈一些空头理论，把眼光多放在翻译实践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查明建认为，翻译研究存在着过于浅显、缺乏思想深度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加深其学术性，提高其思想性，使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相结合，使学术性与思想性融为一体，翻译研究也应该对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等作出贡献。

“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谢天振谈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文化外译，在文化外译的过程中，要重视“译入”跟“译出”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地用译入实践中的翻译理论来指导译出的翻译实践。文化外译过程中，要避免以“我”为中心，注重文化间的彼此尊重。同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达”，通过翻译建立切实有效的跨文化交流，使翻译的内容能够在译入语境中得到接受、传播并产生影响，因此要注重“信达雅”的指导作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姜芹谈到，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一方面要依赖翻译，将更多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使其流通范围超越自己的文化原产地，即“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对翻译出去的作品进行研究、诠释，让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成为他国文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对其施以影响，给其带来启示启发。因而，作品翻译出去以后，还要有研究紧跟其上，这样才能巩固翻译的效果，真正实现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桩“日积月累、和风细雨”的工作。浙江大学教授许钧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翻译很重要，与文本背后的作者的直接交流也很重要。他以自己和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交往为例说明，中国文学被这些优秀外国作家所了解、阅读和推荐，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而言是非常

扎实而有意义的一步。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安江认为，在大力倡导“走出去”之余，需要在政策层面上建立起“请进来”的目标读者和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对象国的年轻人来中国留学、访问、考察和交流，让他们与中华文化零距离接触，使他们的“中国经历”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点点星火”，这样，中华文化在世界各个角落才有可能成就预想中的“燎原之势”。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苏晖总结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重视经典文学研究的同时，日益加强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关注，并聚焦国际文学研究热点；二是英美文学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欧美其他国家文学、亚非文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还需进一步加强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三是研究方法多元化以及本土化实践。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谈到，要避免对西方文艺理论亦步亦趋的研究态度，而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建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刘建军认为，需要注重观念和方法论的变更，但提出问题比分析问题 and 解决问题更重要，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具有问题意识，善于从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寻找发现潜在的问题。

陈建华、虞建华、蒋承勇、季进、戴维娜、韩子满等学者也参加会议并发言。(世 文)

## 历史与虚构的完美融合

希拉里·曼特尔短篇小说集《暗杀》中译本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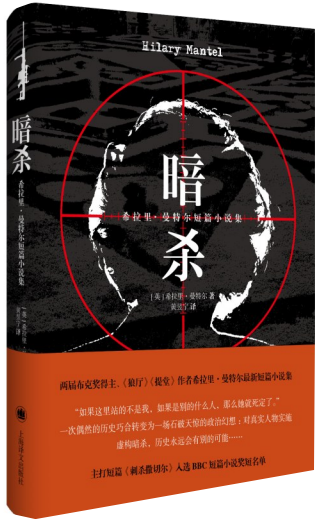
8月18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暗杀》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作家徐则臣、小白、小宝和该书译者黄昱宁与读者一同领略了英国作家、两届布克奖得主希拉里·曼特尔短篇小说魅力。

《暗杀》是希拉里·曼特尔2014年出版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收录了十一则短篇小说。其中主打短篇《刺杀撒切尔》描写了一场关于刺杀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幻想秀，在看似平凡的叙事中，曼特尔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以及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描写了一场灵感来自真实场景和感受的虚构暗杀。该作品入选了BBC短篇小说奖短名单。

徐则臣在发布会上谈到，曼特尔的短篇小说创作更像一段生活记录或者一部长篇小说的节选，而没有达到我们通常意义上短篇小说的完成度，而是以一种陌生的手法呈

现出来，但会觉得很有意思，行文处处充满生机，也充满陷阱。黄昱宁认为，英国作家通常不会非常清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描写一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但曼特尔会在作品中直接展现某个阶级的虚弱或者人性中卑鄙的部分，这很不像英国作家；但是在小说技术方面，曼特尔又有很英国的东西，如视角的转化，她继承了英国的戏剧传统，使短篇小说充满独幕剧的戏剧感。

希拉里·曼特尔出生于英国格罗索普市，1974年，希拉里·曼特尔开始了创作生涯。第一部小说《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恢弘场面，获1992年《周日快报》年度小说奖。1995年《爱情实验》获霍桑登奖。2005年《黑暗深处》入围英联邦作家奖和橘子奖短名单。2003年出版了以童年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集《学说话》。



2009年、2012年凭借历史小说《狼厅》和《提堂》两次摘得布克奖。目前，“克伦威尔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镜与光》正在创作中。(世 文)

世界文坛

SHIJE WENTAN



德国画家安塞姆·基弗作品